



扫二维码 看科学报



扫二维码 看科学网



扫二维码 看大学

无处安放的职业规划教育

■本报记者 温才妃

一份有着甲方、乙方签名、盖章的高考填报志愿协议书被扔进了垃圾桶。连带着宣讲会、协议书上的承诺,也跟着缥缈起来——保证100%被高校录取;不采纳录取建议,本公司概不退款……红霞意识到自己掉入一个“不赔钱的买卖”当中。

交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后,红霞发现,志愿填报服务公司所谓的“100%被高校录取”,不过是再保守不过的方案,保证了录取,却忽略了就业方向和学生兴趣。“若按志愿方案报考,女儿的考分或高出录取分不少,或将来从事艰苦行业不符合自身的兴趣。”

她认为,还不如自己两年来所做的“功课”——翻阅了两本学校发的高考志愿填报参考书,按照全省排名、上下浮动30名——得出的结论精准。

红霞没有采纳专业公司的建议,但却为此付费5900元。

不久前,全国各地公布高考成绩,在考生、家长得知考分后,填报志愿也马不停蹄地进入最后的冲锋。无数个家庭跟红霞一样,遇到了专业选择的困惑。何其难背后,暴露的是基础教育阶段职业规划教育的危机。

被忽略的职业规划

“我们学校是有职业规划课的。”谈及职业规划教育,大部分人的印象和福建省某中学教师姜言类似。这门课程由心理或德育教师讲授,主要解决的是新高考“3+3”改革下如何选择的问题。

所幸的是,即便是姜言所在的农村中学,职业规划课也终于开设了。遗憾的是,课程效果极其有限,仅停留在理论层面,不乏脱离实际、拿主观去规划行动的行为。

而在所谓职业规划课的掩盖下,“12年学习,2天高考,2小时定志愿”依然是全国大部分考生、家长的常态。出分后,考生、家长不是依据个性、兴趣理性填报志愿,而是四处打听哪所高校好、哪个专业热门,盲目填报志愿。有关调查显示,44%的大学新生对所上的大学、专业不满意。

随着新高考改革的到来,人们似乎看到了一丝曙光。“6选3”(从思想政治、历史、地理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6个科目中自主选择3科作为考试科目,浙江“7选3”,多一门“技术”)选科模式、综合素质评价纳入自主招生,使得职业规划前置。

游戏规则的改变,促使原来只在学业终止前做职业规划的人们回过头来关注,却发现过程中的职业规划“一片缺失”。

不能把中小学阶段的职业规划教育简单归于零,起码幼儿园时经常被问到“长大了,你想做什么”就是一种简单的职业规划教育。但显然,目前基础教育阶段开展的职业规划教育的重要性、深度被大大忽略。

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指出,职业规划培养学生四方面的能力——认知自我能力,帮助学生搞清个性和兴趣,不至于报考时陷入迷茫;识别能力,在经济、教育、就业等众多因素牵引中,不受谣言、不准确信息误导,进行独立思考;决策能力,根据外部环境和自身优劣势,选择最适合自身的发展,而不是被家长、教师决策、规划;执行能力,保证学生在脱离家长、教师管理后,有良好的自我管理、自我约束能力,不至于沉迷游戏。“四个能力”也是一个人成为合格社会人的能力。”

就目前中学开展的职业规划课而言,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指出,最关键的是要为中小学生在提供多样性的生活体验。“因为自我认知是建立在社会生活的基础上,不能让教师在课堂上设立一个学生需要拥有的自我认知,而是要让学生在亲身实践中建立认知、感受,据此进行职业选择。”

2018年,教育部发布《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》,将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列入必修课程,要求所有学习都必须学习、参加。职业体验被列入综合实践活动的主要方式及其关键要素之一。

然而,更多的问题还等待着中国教育去克服。

无力打破的怪圈

从苹果园里摘取最大的苹果,条件是从苹果园的这头走到另一头,只许挑选一次。大多数难以实现。同理,建立自我认知、兴趣挖掘,也不是一蹴而就。

“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在中小学开多少职业规划课,而是中小学校的课程设置、教学方式要发生改变。”储朝晖说。

美国从幼儿园—小学—初中—高中,依次建立了职业启蒙—职业了解—职业探索—职业选择的体系。以小学、初中为例,小学阶段将两万多种不同的职业归纳为15个职业系统,让学生通过各种活动了解不同职业的特点,培



图片来源:视觉中国

我国的教育陷入这样一个怪圈——大家都知道职业规划教育的重要性,且有国外成熟做法可资借鉴,但是单一的评价标准、过于集中的管理权不打破,少有中小中学校长敢冒着升学率、中考或高考成绩下降的风险,大力发展职业规划教育。

养职业意识;初中阶段通过对农业、商业、通信、建筑等门类的一般职业训练和社会实践,引导学生按兴趣、爱好、特点尝试选择职业。

类似这样的做法,在不少发达国家已经很成熟。然而,在中国,中小学要开展这样的教育却是举步维艰。

“开展职业规划教育意味着,要认识和发展自身个性和兴趣。而按分数选拔的评价体系,并不关心学生的个性和兴趣。学校教育、家庭教育、社会教育都围绕升学科目进行,这就导致了学校不重视学生个性和兴趣发展,家庭担心关注个性和兴趣发展会影响学业。”熊丙奇说。

评价标准单一、管理权过于集中,滋生了整齐划一的群体。

储朝晖指出,全球范围内,少有国家只有高考这一单一评价标准,大多数国家都采取多元评价体系,如日本有四类考试保障学生进入大学,且很多国家的入学考试多为验证而非选拔。

在多元评价标准下,国外学生对数学感兴趣者,可以多学,对数学不感兴趣者,可学难度低的数学,其选择并不会影响升学。而在单一的评价标准之下,中国学生不问个体差异,不得不学着一样难的数学,只因为它是高考必考科目。

中小教育强调共性,在主管部门统一管理的步调下,就连学生作业都有明确的规定。中小中学校既无法按照自身的教育理念办学,同时倡导个性和兴趣也会让他们感到难以管理。

新高考选科似乎带来了选择的曙光,但“即便如此,新高考给学生的选择空间还是有限,因为高考看总分,大家追求的依然是更高的分数,而不是为了未来的学业发展、职业发展,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学科”,熊丙奇说。

基础上,结合规划,要求不断完善。”

开展职业规划教育,还缺少课程体系建设。包括课堂上对学生系统进行系统的知识介绍,课后与学生进行现场活动交流,校外的社会实践、社会公益,形成完整的课程体系,最终提高职业规划能力。

在熊丙奇看来,这实际上与高中阶段的综合素质评价连在一起。新高考改革要求中学进行综合素质评价,德智体美劳需要相应的空间,培养学生劳动意识,要有社会实践、社会公益;培养学生创新创业意识,要让学生了解职业。

“其中的问题是,有的中学并不愿意给学生空间,学校认为挤占学习时间,要求学生把时间都用在课堂上;家长反对,认为这是给学生增加学业负担;学校、家长考虑安全因素,更愿意学生待在教室。”熊丙奇说。

在课程体系建设中,储朝晖最看重的是生活体验。“生活体验不仅来自企业,也应来自农场、街区、山川、湖泊,这是学生做职业规划的前提和基础。地区差异、城乡差距固然会影响认知,但是不同地区客观上对职业的选择也会有所影响,人为设置主观因素反而有可能产生负面作用。”

也有人提议,用浸入式课程增加学生对职业的理解。比如,小学应用题大量增加,借助场景让学生明白数学在生活中的应用。然而,有专家指出,这固然有助于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职业理解,但也不乏为了追求应用牺牲学科精神的例子,如平面几何从大纲中删除。

在采访中,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洪成文表示,过度追求应用导致基础教育下滑,是我国改革开放前走过的弯路。“教材改造应掌握好基础和应用的平衡。”

此外,开展职业规划教育,还遭遇价值理念的冲突。熊丙奇表示,很多中学把学生考取北大、清华作为重要的办学评价标准。“一旦进行职业规划教育后,学生有了主见,不想去北大、清华而想去另一所学校,学校就会认为进行了职业规划教育反而坏事。”

尽管障碍重重,熊丙奇表示,开展职业规划教育聊胜于无,“这是一个互相影响的过程,开展了职业规划教育,学生有了主见,家长的思想价值观念逐渐发生转变,才能实现职业规划教育从无到有、从局部到全部,从表面到深入,最终逐渐做到重视学生个性、兴趣”。

不容回避的大学引导

从职业规划的角度看,大学与中学的割裂是显见的。无论是招生咨询会、校园开放日,还是大学先修课上,很少有大学会告诉考生、家长,“你不适合我们学校”。

从新高考来看,大学对想吸引什么样的考生报考,也研究甚少。“3+3”科目改革后出现的弃考物理现象,就是源于大学不提物理要求、科目不限,盲目抢夺生源的一个结果。

“大学引导学生职业选择,自身理念很重要。大学要关注中学生的职业规划教育,就必须引导中学生根据兴趣选择适合自己的大学、专业,为此大学首先要办出特色,有非常明确的育人标准,而不是一味地抢高分生源。”熊丙奇说。

为什么大学在招生入口无力发挥职业规划的引导作用?

除了大学自身的“千校一面”问题,储朝晖认为,这与我国评价标准单一,高校没有真正的招生自主权,代政府招生有莫大关系。如果评价标准多元,教师必然也会采取多种方式培养学生,学生不必担心考不上一所好大学,而是有了对多的选择。

但眼下,中国仍是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”。寻找兴趣的任务,以另一种名目交给了“大类招生”。

有意思的是,如果从个性、兴趣挖掘的角度看大学中大类招生,颇为为中小学职业规划教育“善后”的味道——学生不知道兴趣所在,便“钻”进一个大类,等一两年后再进行具体的专业选择。

就像俄罗斯套娃,层层剥离,最后明心见性。洪成文认为,寻找兴趣并不是一个激进的过程。高中、大学二三年级、研究生、步入社会,每一次分流都带来一次兴趣的自省,找不到兴趣的个体只会分流中越来越少。

“最关键的是,大学要开展高质量的通识教育,进行基本知识和能力的培养,一旦学生基础知识打牢以后,拥有一定知识迁移能力,在职业选择上也有更宽的范围。”洪成文说,这也契合了现代职业快速变化,一辈子做多种工作的人越来越多的现状。因此,部分学生的职业规划后移至大学二三年级也无伤大雅。

当然,高校不是把学生按大类招生招过来就了事,而是要尽快地了解学生,进行有针对性的培养。“不能搞了大类招生之后,毕业时每个个体都是差不多的‘同类’,在这方面高校需要更多地开动脑筋。”储朝晖说。

中国大学评论



尤小立

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

当下中国的高等教育处在一个转型的时刻。可以这样说,这个转型时刻比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显得强烈而切实。

事实上,从上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“大众化”开始,中国大学已经在转型了,只是太过明朗反而让人忽视了它的影响力,其余波所向仅仅被定义为“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”,却很少关注“大众化”的教育本身如何决定了高等教育的走向。

这些年,尽管我们仍不断听到大学管理者有关高等教育的颇为“高大上”的言论展示,大学也在诸如经费增长、学科规模和人员职称上表现不凡,但都不能掩饰一个事实,就是越来越像职业培训中心。

就教育的要求来说,从“精英化”转向“大众化”已经在降低标准了,“大众化”再转向职业培训,标准不仅是降低,而且由于职业培训是面向用人单位的,用人单位成了“立法者”,大学也因此失去了订立标准的资格。

这个令人尴尬的现状,本该成为激发大学管理者和从业者反思的一个契机,但是在公司化的教目管理成为时尚的今天,它同样被轻易地绕了过去。

当然,对高等教育进行分类是一个解决办法,研究型、教学研究型和教学型之类也是国际通行做法。但一方面分类并不统一,且没有明确的科学规范,所以现在流行的所谓“大学排行榜”就径自发明出诸如“星级”分类法(像8星级大学,恐怕是从迪拜8星级酒店那里获得启发的)、“流品”分类法(如“世界一流大学”“国内一流大学”等),它们对社会上不了解大学实际情况者的影响也愈来愈大。另一方面,研究型、教学研究型和教学型的分类固然是个解决办法,但是在中国,如果缺乏动态管理,固化的大学也很难形成持续的追求。

更重要的是,无论研究型还是教学研究型、教学型,首先都是学校。依照经典的概念,学校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教育,这也是学校区别于其它机构的一个标志。就是说,从理论上言,这三种类型的大学都不能失去教育这个基本功能。

高等教育“大众化”可能只是教育功能弱化的前提,因为不能说大学里学生多了,就必然影响教育的功能。延伸的问题是,即便是大学成了职业培训中心,还不需要体现教育的功能?

现在看,人们对于高等教育“大众化”的认知影响到大学的管理。“大众化”与“职业培训中心”这两个概念被勾连在一起,似乎天然地促成了“知识至上”论和“技能至上”论的兴起。个别管理者眼中,知识和技能是第一位的,也只有这两项才是解决就业的良方,最终决定学生的命运。这种将知识工具化的认知就是典型的实用性原则。

依据实用原则,所谓文化素质就变成了“唱唱跳跳”,那些从小受父母逼迫上社会中的培训班练习“吹拉弹唱”的学生仿佛有了用武之地。结果是,文艺晚会的专业水准明显提高了,学生却越来越不懂得尊重老师和他人。更有甚者,个别学生因为老师的严格要求,利用评教的机会给老师恶意打分,类似的行为得不到惩治等于是变相地鼓励。表面看,这是制度漏洞所造成的,但也与管理者对于大学教育功能的理解不足有关。

教育功能之一是解惑,这个“惑”是人生之困惑。实用或曰现实主义原则固然可以解决眼前的、一时的困惑,但它同时也在造成新的困惑。人是高等动物,他依靠工具爬到树上后,并不能够完全满足,他还要问为什么,或者去爬更高的树;他爬树的过程也是价值观形成的过程。这些就不是单纯的知识和技能传授能够解决的。大学如果舍解惑而不顾,仅仅满足于解决就业,不仅是降低了自己的目标,也是在规避自身的社会责任。

然而,现实中的大学,实用性、工具性、技能化与应试教育结合在一起,似乎正在向这个低层目标靠拢。加之那个关于大学的“道”已经在实用原则下被肢解得支离破碎,它不再是一个明确的“一”,而成了模糊的“多”,这个无数的“多”令人难以把握。

按照大学之道,解决困惑与传授知识从来都不是分开的,它们相辅相成,相互配合,支撑着大学及其教育。但现在,它们成了两个似乎独立的门类。传授知识成了一项技术,它只与技能相关;而解决困惑则与不断进展的新知分离,独立地在那里自说自话。

乐观者会说,分久必合,到时候它们照样可能结合在一起。但《三国演义》里的这句名言未必适合诠释当下中国大学及其未来。即便是能够诠释,事实亦确如所愿,但可能会付出几代人的文化素养、道德水平无法提升到更高的层次的代价。

当下中国的高等教育之所以处在一个转型的关键时刻,是因为实用原则和现实功利已经被包装成一种新的大学理念,并且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潮流。因此,就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来说,是继续这样实用下去,还是回归“学校”的本质,就成了所有大学管理者、从业者和关心大学的人士此刻面临的一个选择。

当下大学教育:解决困惑还是传授知识